

手中有活干 小康路更宽

——来自我国大西南地区“三区三州”产业扶贫的报告

□ 李力可 刘洪明 杨静

“三区三州”是我国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实现脱贫目标？脱贫后如何可持续发展、稳步迈向小康之路？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节点，我国大西南的“三区三州”地区从政府到企业、到群众，因地制宜，积极探索产业扶贫、产业稳脱贫成果、产业振兴乡村的路子，各类扶贫产业在“三区三州”落地生根。

产业支撑脱贫攻坚

产业扶贫是撬动贫困地区发展、增加贫困农户收入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广大的“三区三州”地区，脱贫方式多种多样，而产业扶贫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特合村第一书记刘强表示，通过整合产业发展资金和与公司合作，村里新建成了6个生猪代养场，每年可为每户贫困户分红1000元，在产业带动下，该村贫困户人均年收入已超万元，贫困发生率从29.6%降

至2.19%。贫困人口从2013年的51.8万减少到2019年末的17.8万，贫困发生率在6年间降低到4%，产业对凉山脱贫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据统计，凉山全州种养大户已突破10万户，各类经营主体农户带动面达75%以上，50%以上的已脱贫人口中依靠发展农业产业实现脱贫。

2016年以来，西藏累计投入362亿元实施扶贫产业项目2661个，带动了23.8万人脱贫。而在四川藏区，201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投入财政扶贫专项资金132亿元，全面推进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统筹发展，实现7125户3.1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0.23%。

在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2015年以来，当地累计投入产业发展资金4.3亿元，中药材、特色畜禽、高原杂粮、蔬菜等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综合贫困发生率降到了2019年底的0.38%……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游则游，产业

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第一工程”，筑牢了“三区三州”的脱贫根基。

产业发展“准又稳”

在“三区三州”地区，复杂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在塑造了独特的自然景观的同时，也曾是制约当地产业发展的屏障。而如今，最常能听到“生态是最脆弱的资源、也是最宝贵的资源”的说法。依托生态本底，找准产业发展方向、把稳脱贫基础，农林产业、现代农业、扶贫车间、乡村旅游等不同产业发展，让困难群众从“看天吃饭”变为“靠产业吃饭”。

“工作的地方离家只有2公里，每月工资4000元，再也不用四处打工了。”今年45岁的索朗，在西藏日喀则市谢通门县达那乡一家产业扶贫企业工作。他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食用菌生产加工，目前日产食用菌2吨~3吨，127名工人中68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从田间地头到扶贫车间，扶贫产业链越来越完善，现代农业挑起了“三区三州”稳定脱贫的

“金扁担”。

在四川凉山，绵阳市涪城区、佛山市禅城区对口帮扶工作领导小组与昭觉县共同组建的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已经建设了标准蔬菜、食用菌种植大棚500余亩，3年内将建成占地5000亩的现代农业园区。2019年，凉山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资金到位7.7亿元。“打赢脱贫攻坚战，东西部产业合作是促进产业发展带动脱贫的重要举措。”从广东佛山市到凉山州昭觉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徐航深有体会。

而在三江并流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全州30个旅游扶贫示范村正加快建设，依托特色旅游资源培育750户旅游扶贫示范户。当地群众依靠旅游产业，实现了楼上居住楼下就业。

为全面小康注入活力

产业扶贫，不仅是“三区三州”地区脱贫的“定心丸”，更是奔小康的“强心针”。

湾地沟村是四川甘孜州雅江县53个贫困村之一，全村有

建档立卡贫困户16户52人。在有关方面的定点帮扶下，湾地沟村依托海拔相对较低、日照充足、林多地少、水质优良的自然条件，由帮扶单位、企业和村合作社共同出资360万元，在村里建设了大型养殖场，4年来共向村民分红80余万元，为贫困户增收脱贫起到了重要作用。帮扶干部张会东表示，2019年，该村贫困户人均分红达到了1000元，非贫困户人均分红730元。

在海拔4250米的西藏那曲市色尼区罗玛镇普拉村，从草场深处搬迁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布次仁实现了养牦牛的梦想，成为牦牛牧场职工的一家三口人均年收入如今已经达到3万元。“我学到了养殖和牧场管理技术，儿子正在学习驾驶，希望成为牧场的驾驶员。”

手中有活干，奔小康更有信心。扶贫产业实现了深度贫困地区生态资源到产业价值的转换，特色产业如今变成了“三区三州”地区的“金字招牌”，为脱贫奔小康注入了强大的竞争力。

区域时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区域统筹探索

□ 逢锦华

十九大报告首次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体现了区域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当前，区域发展的理论建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逐步加深，从基于发展不平衡开始，上升到新时代经济要素背景下的区域协调划分；从区域板块上的沿海经济开放区、内陆的理论，再到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区域划分；从城市群建设的理论，到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环渤海城市群、大中型城市群、中心城市、特色城镇等规划，构建了以城市群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时代区域建设理论。

我国区域发展的区域内平衡性逐步增强。区域建设在新时代的经济要素要求下进行了新的调整，开始以省际区域和区域城市群为联动进行城市协调发展，出现了南京产业带动皖南、广佛交通同城一体化、青岛日照港口联动等区域一体化现象，使得区域竞争变成比较优势的合作，形成更好的区域协调的平衡。而在发展差距的平衡上，通过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经济体的点线链接，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区域发展的跨区域协调性逐步完善。在东、中、西和东北的振兴过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平衡发展政策开始于差别化布局，即东部继续引领，中部崛起到跟进，西部振兴到大开发，东北从老工业基地到扶持冰雪地的绿色生态发展，都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新产业和新行业的理解上的更新。从京津冀、长三角、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协同和中原经济区、大湾区等综合性城市群配合到引领区域公共基础设施标准化，并加快社会资源的区域内流动，四大区域板块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了以政策引领、市场共建、文化互融的跨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体现了跨区

域协调发展的优势。

区域发展的大城市、城市群带动作用显著。国家中心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概念随着各区域板块之间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带动，其作用逐渐形成新的发展力量。重点城市及城市群的主体，并相互影响，使得城市群在治理模式和资源调配上进行区域一体化调整，进而形成制式上的统一，这符合市场经济对于规范化商品的边际成本最低的诉求，也能使城市间融合更加快捷。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的都市圈城市群以及中原、成渝等国家级城市群的逐步成长，对区域内资源的整合能力会愈发加强，突破省界和市域限制，实现区域带动协调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的城乡经济要素联动提升。市场经济将城乡二元化的体制撕裂，将原有的分割状态打通，乡村振兴战略得以推动。农村产业和村镇企业在接入市场经济的商品竞争之中，进行企业化改革和股份化分红，特别是农业实现土地整合和机械化作业，增加单位农作物产量，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建立道路、自来水、燃气、网络村村通等工程，缩小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开放中小城市和部分大城市户籍限制，使劳动力人口和土地要素相匹配，实现城乡在经济发展中的要素联动。

从传统转向现代，从小农经济转向机械化农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生产制度不断发展变化，而区域建设和地区协调发展是对政府提出的治理模式的新要求。未来，我国将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发展的持续性，带动区域增长极建设、带动周边经济辐射，完善区域内和跨区域要素市场整合，推动城镇化的过程，通过高效、协调、可持续的新模式探索，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独特优势下的区域共同富裕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构建“双循环”新格局 助力区域经济再升级

华夏幸福密集布局长三角都市圈，加快布局粤港澳都市圈，推进布局郑州、武汉、成都等核心都市圈

□ 陈昌成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双循环新格局正在激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活力。21世纪经济研究院近期通过对24个千万级人口都市圈的样本研究发现，构建“双循环”格局，或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路线图。

21世纪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美琳表示，以大城市群和都市圈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将扮演重要角色，其核心是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大规模创造新消费场景的投资，进而带来消费升级的质变，使得供需两端的循环形成闭环相互强化。

这一判断与华夏幸福研究院的研判结论高度一致。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表示，内循环会激活更多的市场，更多的产业，更多的业态和更多的模式。在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实践中，无论城市更新，还是产业升级都将在“双循环”的新战略下完成逻辑重构，而这一进化也将对“双循环”的战略落地形成内生支撑。

让城市更新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刊发社论指出，随着增长环境和增长条件的重大转变，加快推动和融入“双循环”已经成为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的必然选择，将“双循环”走深走实是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

这篇社论认为，作为融入“双循环”的主力军，各大城市群齐心协力推动基础设施网络化、产业分工协作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素配置市场化、生态保护一体化，中国经济航船就一定能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通过长期的观察与研究，顾强认为，都市圈已成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未来都市圈发展的竞争力将取决

于核心城市的创新高度、都市圈的网络联系强度和都市圈的政策协同力度。

多年来，华夏幸福一直是都市圈理论的坚定实践者。在深耕京津冀都市圈的基础上，华夏幸福密集布局长三角都市圈，加快布局粤港澳都市圈，推进布局郑州、武汉、成都等核心都市圈。通过产业新城和开发性PPP模式，华夏幸福帮助政府提升区域的资源、资产和城市价值，实现“区域价值最大化”。

位于京津冀都市圈的河北固安县就是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实践的最佳样本。2002年6月起，固安县政府与华夏幸福共同探索PPP模式，华夏幸福“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产业新城发展理念在固安落地。

如今，在固安产业新城的带动下，固安一改18年前的样貌，从昔日的农业大县，转变成智慧生态、宜居宜业、创新驱动的现代化工业强县，并开始向着科创城市迈进。

到目前，固安已经形成了三大主导产业（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一大先导产业（科创产业）、三大特色产业（临空服务、文体康养、现代农业）的“313”模式，并初步搭建起了全球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形成了“全球技术、固安加速、中国创造”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让产业更优

华夏幸福一直坚信，除去人口因素，产业是发展的内核，这是都市圈发展最大的基本面。“从产业维度看，强化核心城市的创新高度与辐射区域先进制造基地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将是催生都市圈发展的新动能。”顾强表示。

顾强发现，从更大范围来看，无论是在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还是在中部的武汉、西部的西安等，可以看到这样



2020固安旅发大会开幕现场

（固安产业新城供图）

的双循环；产业链的一个区域产业集群循环，都市圈内部的产业体系的循环，整个国家产业间的循环和国际产业间循环。

此前，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推动都市圈内各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为导向，推动中心城市产业高端化发展，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促进城市功能互补、产业错位布局和特色化发展。

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于一洋表示，成熟的大都市圈其产业布局一定是中心城市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为主，环中心城市分布高端制造业，重化工业等传统产业的更加外围的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产业链的上下不同环节在都市圈范围内的合理有序的转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而“产业优先”就是华夏幸福运营产业新城时一直坚持的核心策略。产业新城因其本身属性将成为承接中心城市外迁产业、夯实中小城市制造业基础、通过打造和培育特色产业

与中心城市形成功能互补、产业分工的主要承载阵地。

多年来，华夏幸福以产业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组建了庞大而专业的产业发展团队，通过创新驱动、资本驱动等多种市场化方式，探索“全球技术+华夏加速+中国创造”产业孵化模式，持续提升自身的产业发展服务能力，为合作区域打造出百余个先进产业集群，带动县域经济“活起来”。

让企业更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新格局，对中国企业而言是全新的发展环境。”顾强认为，内需市场加上全球重构之后，到了规则求胜的时候。要真正走到价值链的最高端，对中国企业而言就是用硬实力加上软实力来提升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对中国来说，大部分的产业有龙头企业，也有规模效应，集群也正在形成。但随着产业的升级，人们可以看到产业从传统制造业集群变成创新集群，这里边需要更多的要素、更多的链条、更多的物种，也产生

出更多的业态。

华夏幸福产业新城实践正在通过新基建、公共服务拓展新的市场空间，通过龙头招商激活产业价值链，通过生态型产业服务赋能企业全生命周期，从而给企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企业带来新的动能，新的增量。

以新型显示产业为例，在河北固安，华夏幸福导入京东方、维信诺、鼎材科技等30多家新型显示上下游企业，千亿元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初现。围绕“全球显示之都”——合肥都市圈，华夏幸福引进了一批龙头项目——总投资135亿元AMO-LED柔性显示触控模组与5G智能终端项目落地舒城产业新城，投资50亿元的偏光片生产基地项目落地长丰产业新城。

在“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广东中山，华夏幸福相继承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联诚发和“新三板上市公司”元亨光电。两大新型显示领军企业的进驻，为粤港澳大湾区建成更高开放水平的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注入新动力。

“法治沂蒙行”采风活动近日举行

本报讯 由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10余家中央及省市媒体共同参与的“法治沂蒙行”媒体采访团集中宣传活动近日举行。采访团深入临沂法院系统一线，深入采访了“六调联动”一站式多元解纷、智慧法院等亮点工作。

在临沂市中院诉讼服务中心，采访团来到立案大厅、信访大厅和执行大厅，感受了临沂中院近几年在硬件和软件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在诉调对接中心各个工作室，采访团还详细了解多元化解纷机制。

据介绍，在诉调对接化解矛盾纠纷方面，临沂中院进行了积极探索，全面加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对原有的诉调对接机制进行了提档升级，打造了集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商会调解、律师调解与行政和解、执行和解为一体的“六调联动、一体推进”的“一站式”解纷新机制，实现了“诉”与“调”的精准对接，“调”与“裁”的无缝衔接。（文排章）